

魏晋六朝与晚期罗马的 语言活动与宗教翻译

蒋哲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魏晋六朝与晚期罗马的 语言活动与宗教翻译

蒋哲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六朝与晚期罗马的语言活动与宗教翻译 / 蒋哲杰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5161-7539-2

I. ①魏… II. ①蒋… III. ①语言学史—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②语言学史—罗马③宗教经典—汉语—翻译—研究 IV. ①H0-09
②H0-095.46③B92④H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1804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7.25
插页 2
字数 272 千字
定价 6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傅惠生

我指导的博士生中，蒋哲杰是唯一本科、硕士和博士都是在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读的。他的本科学年论文是我指导的，后来他考了我的硕士生，我又建议他跟我读博士。如今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过的书稿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由衷地感到高兴，乐为之序。

回想 2008 年前后的招生情况，当时考博的多数是大龄且有工作经验的高校老师，我发现一些应届硕士生，没有发表过专业论文，甚至连硕士毕业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与年龄大的考生相比不够成熟，但是他们开始读书的时候，整个国家都在快速发展，所受教育没有任何干扰，一路上到硕士，应该说具备了比他们年龄大的考生所不具有的一些优秀素质。从人才发展和教育的角度讲，有新时代的气象：眼界开阔，思路灵活，开拓精神强。这些正是博士生必须有的。我连续招了几个应届硕士生，开始真的担心他们发表专业论文的能力、毕业论文能否写的有分量等问题，结果比我自已预料的好得很多。

哲杰论文写作过程中，我们讨论思考的问题不少，这里仅就与他互动时思考谈论比较多的三个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选题内容范围和幅度的宽窄问题。传统上讲，论文写作强调“切口小”，由一个很小的地方入手，不断深入挖掘，以达到深入研究某个问题的目的。但是，随着博士生教育的快速发展，“切口小”显然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固定模式”，而一旦成为固定模式，这个问题便需要思考。博士论文的写作方式是丰富多样的，根据具体情况形成贴合问题表述的自然合体的论文，就如同开矿一样，任何一个矿脉的形成和状态都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是露天矿，可以大面积地开采；有的则有可能在深山曲

折的矿脉中而需要深井开挖，等等。博士论文的写作有点类似，应该根据问题的大小、特征和涉及范围，作灵活的变化处理，讲究方法论，但具体操作时，又应该是法无定法。相应地，这里就有一个选题内容的宽窄或幅度大小问题。我比较倾向于选范围宽和内容幅度大一些的题目，这样做也是多种因素形成的经验之谈：1) 当下在读多数博士生开始选择具体研究题目时，实际知识和思考研究的积累不够丰富，如果没有一个相对宽度的阅读和了解，难以形成达到博士学位论文写作的基本要求，选题内容宽一些和幅度大一些的题目，也迫使他们在限定的时间内多读一些必要的专业以及相关的书籍，深入了解和思考研究的对象。2) 选择范围宽和内容幅度大，并不意味着论文一定要完成整个范围的研究和写作。可以先有一个对研究范围的大框框的了解把握和深入认识，然后主要集中具体细致地讨论一些局部的问题即可。这样做是为了留有一定的研究空间，让博士生在毕业之后，继续这一课题的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就目前而言，如果三四年时间仅仅是选一个小题目写一篇论文作为敲门砖，我认为是达不到培养人才目的的。博士期间打下的基础，应该能其在未来的研究中以博士论文作为坚实的学术基础和看家本领的一部分，同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可以比较容易拓宽研究领域，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3) 参加国内一些专业学术会议时，碰到一些毕业的博士，聊到他们工作后的研究工作时，因为论文选题过小，毕业后进入工作岗位有一个相对比较长时间要适应工作和处理生活问题，研究要另起炉灶显然力不从心，而紧接着的职称评定又需要各种成果。从人才培养和发展的角度而言，我认为选题宽，可以利用人才培养阶段对工作后紧张的科研成果要求进行某种程度的缓释。可能许多导师和专家们不同意我的观点，这里只是表达自己的思考和对博士生作为人才培养问题的关注。哲杰的论文一开始就是沿着这种思路商量设计的，当然，这种设计也有具体的针对性，即应届硕士生读书量的不足和对人与人类社会了解的相对局限。也正如在本书的《后记》中，哲杰自己所意识到的那样，自己的相关课题有了初步的成果，而前面的研究则道路宽广。

第二、自主和自立能力的培养。应届硕士生相对而言比有工作经验的大龄教师容易指导，这不意味着他们的培养不需要花什么气力，而是要“因材施教”，努力做到巧用力，收效好。这一点，我在辅导应届硕士生，特别是哲杰的论文写作过程中，感受比较深。他的硕士生阶段的专业方向

是翻译学，论文写的是《文心雕龙》的翻译研究。博士生的研究方向是中西文化比较。因为先前我的两位博士生李志强和吕占军分别就先秦与希腊语言文化关系比较，和汉代与罗马语言文化关系比较做了选题研究。我问他是否愿意接着前面两位的历史时间段去做，他并没有犹豫，一口就答应了。这让我非常高兴，同时又有些担心。这个孩子能够做这样的大题目吗？高兴的是，事先我已经反复跟他说过，博士论文二十万字，与硕士论文三万字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差别，方方面面的要求都有很大的差异，他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有充分的信心。后来他写论文时的专心致志和迅速发展的状态，使我相信他是能够做好论文的。

我们虽然多次讨论了整体论文的框架设计和写作方法问题，但是具体如何做，我很少说。我主要想看看他是如何将“虚”的思考，无论是宏观设计还是具体写作，落实成“具体”的语篇。这是他成长为能够自立自主思考和研究问题的关键。写作开始的时候，他也问一些具体如何写的问题，我只是作一些方向性的提示，并没有说过什么具体如何写。经常告诉他的，需要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将自己的阅读理解和对于问题的思考化为具体清晰的文字，表述清楚自己究竟想要说什么，如何说才能说清楚，以及明确自己想表达和解决的是真正的学术问题。

从他自己的研究总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研究对象宏观把握的思路清晰和认识深度：

本研究的特色在于从文化的角度研究语言。就文化史而言，从先秦与古希腊到两汉与罗马，中西方的发展可以大致进行平行观察；而魏晋六朝与晚期罗马作为轴心时代后的第一个大转折，是两大文明开始分道扬镳的十字路口，因而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格局发生巨变，新与旧、本土与外来相互交流、冲突与融合，历经数百年才逐步稳定下来形成新的格局，并进而奠定了之后中西方千年思想文化格局的基础。

这种思想文化的巨变发展必然会影响到语言面貌及其文化内涵。因此，我们将目光聚焦于与思想文化密切相关的文化语言活动，研究语言活动的内容、形态和相关语言观，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文化语言活动，研究语言活动的内容、形态和相关的语言观，以及与之密切相

关的翻译活动的形态、内容和观念。

在语言与文化的历史关系中，握住“经”的发展主线，并将其发展为论文的主体框架，并能够将其化为具体的叙述，完全是他独立自主的努力，这样的历练使我相信，他是一个有研究才能和发展潜力的博士生。他对于自己研究的框架设计也是十分清晰的：

研究以“经”为主线索。“经”作为思想文化典籍，既是文化的、也是语言的，是文化—语言的界面。就文化而言，本著的“思想文化”在中国指儒家、玄学（道家）和佛教三个主角；在西方则只有基督教这唯一主角，但希伯来文化、希腊文化以及罗马文化是始终参与其中的配角，配角中又以希腊文化最为重要。就语言而言，一种思想文化体系的语言可大致分成作为主体的“经”，以及围绕经的各种语言变体，两者是主体与变体、一与多、通用与特殊的关系。围绕着这种经的本体与变体，可以开展各种文化语言活动。一种思想文化在新环境中从无到有、从有到优地发展起来，在一段相对完整的发展周期内，从继承、发展、传播、冲突到融合的过程中会有不同的阶段性任务，促使人们以不同方式利用语言和塑造语言，从而对从属于这种思想文化的语言乃至整个语言造成各种影响，因而我们选取注经、解经、译经、立经四种语言活动分别研究思想文化的演变发展对语言的影响，以描述和阐释佛教与基督教的文化体系进行跨文化发展的进程。

在四章主体内容中，我们通过中西共同的文化背景来描绘语言活动的图景，包括活动的形态、特征、发展线索、主要成就、重要观点，并探索语言活动的上述方面与翻译的各种关联。从整体上来看，佛教与基督教不仅要通过狭义的文本翻译实现语言转换，更要通过注疏、翻译、创作这一宏观的语际移植过程，沿着“理解—转换—表达”这条翻译链建构汉语佛教与佛教汉语以及拉丁语基督教与基督教拉丁语，在目的文化圈实现语言和文化的双重融合，完成思想文化的翻译。因而我们用语言活动涵盖翻译，从而将与翻译密切相关的活动与翻译一起纳入语言活动这一范畴，实现基于语言活动的翻译史

研究。

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根据这本书来评价蒋哲杰“文如其人”，但根据上面简明扼要的宏观认识，可以看出他对研究对象清晰而抽象的把握和具体语言表述落实的分寸感。因此可以说他已完全具备独立自主作视野开阔、较大课题研究的能力。因此也表明我们达到了基本的培养目的。

这里就研究对象本身而言，还有一个拉丁语学习的问题。论文题目确定之后，我多次催促哲杰抽空学习拉丁语，尽管是勉为其难，他还是努力了。我仍然认为博士论文只是专业培养和训练，是专题研究的开始，要有所建树，还靠日后的日积月累。因此，对于哲杰来说，拉丁语的修养是个必须。我想说的是，他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他的师兄李志强。李志强在写先秦与希腊语言文化比较时，学习古希腊语，当时也觉得十分困难，但是他克服了，并且做得不错，毕业后还获得了去希腊学习一年的机会，回来后，结合自己的博士论文基础，申请到了国家项目。这让我想起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教授曾经说过的，比较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就应该有一些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专家，而比较研究时，就应该能够精通原文并直接从原文进行解读和比较。哲杰若有志，是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坚持下去，定会有所成就。

第三、“三十而立”和“四十不惑”的成长转型。一般而言，我们说“四十不惑”，说从事文科研究的人开始能够写作有分量的论文，对人和人类社会开始有一定程度的成熟认识。显然，现行的文科博士生培养制度使得不到三十岁就毕业工作是一个常态。这种情形与实际文科研究者成熟度的要求显然有一个实际的差距。社会科学研究人才的培养按照当前国家的发展态势，对于当下博士生的培养以及后续的发展可能的确有一个“三十而立”和“四十不惑”的过渡转型问题。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当前博士生顺利地本科、硕士到博士毕业的年龄在28至29岁，加上两年博士后就30岁了，而马上进入工作岗位，首先面临的是端好饭碗的问题。又有买房和建立家庭的问题，同时面临职称提升的多种学术要求指标问题，等等。因为和哲杰的这种特殊的缘分，毕业以后他在学术发展上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他试图和我商量。其实他的问题在发生在许多同龄毕业生身上，我始终抱着一种态度：毕业了，我就不管了，因为我自己也忙不过

来。但毕业生多了，每次见面反复交谈，虽然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一样，这种过渡转型带有共性的问题，也真的需要思考和交流。我的经验之谈仅供哲杰和想和我就毕业后学术发展问题进行讨论的朋友参考：1) 端好饭碗是根本。现在博士生毕业，一般会在高校教书，找到工作，往往有一个岗位适应期，在新岗位站稳是最重要的。同时也应该思考结合工作要求，作相应的科研。2) 学术的功底不能丢。不能因为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而将自己的学术研究暂时搁置一旁。“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对于哲杰而言，就是他博士论文方向的研究，再忙不能轻言放弃。只要坚持，不断开拓，十年必有相对大的成果。博士毕业后的研究时间段可以从一生的角度进行不同的安排。3) 比较文化专业方向和翻译学方向足以使哲杰可以不断自我设计、发展和完善。自己的修行是终身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自主坚强，不怕各种压力，坚定信心，就一定会有所成就。

2016 年初
于沪西琥珀斋

目 录

序	傅惠生(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解题与缘起	(1)
一 跨文化发展	(4)
二 语言/翻译活动的研究	(6)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8)
一 研究现状	(8)
二 本研究的理论特征	(10)
三 研究方法的相关说明	(13)
第三节 研究内容	(19)
一 研究内容的相关说明	(19)
二 研究内容概述	(24)
第二章 注经：理解与传承	(26)
第一节 宗教经文的注疏活动	(27)
一 佛经注疏活动	(27)
二 基督教的字面解经派	(34)
第二节 从注疏到释经学	(42)
一 作为综合性模式的儒经义疏	(43)
二 圣经注疏与基督教释经学的形成	(48)
三 文化发展与注经的互动	(55)
第三节 注疏的翻译意义	(58)
一 加强对语言问题的重视	(58)

二	加强对“本”的重视	(60)
三	提升经本的权威性	(63)
四	提高理解能力	(65)
五	提高语言运用与语言研究能力	(67)
六	语言研究的进步及其思想史意义	(70)
第三章	解经：阐释与接纳	(73)
第一节	中西解经活动与解经观的发展线索	(75)
一	玄学解经观的演变与解经语言的发展	(75)
二	圣经阐释与解经学的发展	(79)
第二节	解经的文化会通性：“得意忘言”与“寓意解经”	(84)
一	两种解经法的共性	(85)
二	两种解经法的差异	(93)
第三节	解经的翻译意义	(95)
一	佛教解经的翻译意义	(95)
二	道安的释经与翻译	(97)
三	罗马的语言活动与翻译	(106)
四	哲罗姆的释经与翻译	(111)
五	阐释型的翻译制度	(119)
第四章	译经：转换与交融	(123)
第一节	译学萌芽：道安与奥利金的经本研究	(124)
一	道安早年的经本整理与研究	(125)
二	奥利金的经本整理与研究	(130)
三	经本研究的翻译史意义	(134)
第二节	理论家的思考：道安与奥古斯丁	(136)
一	道安对“失本”问题的纠结	(137)
二	奥古斯丁的综合思考	(146)
三	道安与奥古斯丁的异同	(154)
第三节	实践者的观点：鸠摩罗什与哲罗姆	(157)
一	鸠摩罗什的翻译观	(158)
二	哲罗姆的翻译观	(168)

三 鸠摩罗什与哲罗姆的译文中心观	(176)
第五章 立经：整合与确立	(180)
第一节 文学演进与语言新格局的形成	(181)
一 魏晋六朝的文学繁荣与佛教文学的锦上添花	(182)
二 罗马晚期的文学衰落与基督教文学的雪中送炭	(187)
三 两种文学格局的比较	(194)
第二节 语言文质之争：崇文还是抑文	(197)
一 佛教汉语的文质之争	(198)
二 基督教拉丁语的文质之争	(206)
三 文质之争的内涵与意义	(212)
第三节 宗经语言观与立经的文化意义	(214)
一 语言本体观：真道为文本	(215)
二 语言道德观：善用尽文德	(217)
三 语言修辞观：和美显文质	(219)
四 语言变体论：文以载道的实践体系	(221)
五 关于立经的思考	(223)
第六章 结语	(227)
一 研究小结	(227)
二 研究启示	(228)
参考文献	(233)
西文人名与书名对照	(257)
后 记	(261)

第一章 绪论

语言，历史的产物：沿流
——萨丕尔(《语言论》，第七章标题)

第一节 解题与缘起

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 1884—1939)以水来比喻语言，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如果语言是水，那么语言发展就宛如江水长流，纷繁多变：水势或缓或急、水流或直或曲、水质或清或浊，总能呈现一定特征或趋势，而文化则不妨看作语言沿流所在的河道。正如河道影响水流一样，文化环境对语言的特征和发展进程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语言在历史上的每一次宏观演变和部分微观演变都是文化上的原因造成的，而语言的现状是语言历史演变的结果，所以研究语言的历史和现状及其演变过程都必须研究语言的文化背景。”^①在中西方的语言史长河中，魏晋六朝与晚期罗马就是一段关键性转折^②，两大文明的文化形态在这一阶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产生了广泛的文化交流与深入的文化整合活动。这些文化活动一方面依靠各类经籍活动来进行；另一方面又反作用于活动中的语言自身，从而深刻地影响、改变乃至塑造了语言的发展流变。

在魏晋六朝与晚期罗马这个阶段，中国思想文化的格局是佛教东传和汉化，开始初步形成儒释道三家并存的格局。在西方，基督教兴起并逐步

① 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修订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② 本书的“魏晋六朝”指公元2—6世纪左右的中国，“晚期罗马”指公元2—6世纪左右的西方，即罗马帝国晚期至中世纪初期。详见本章第二节的说明。

吸纳与整合希伯来、希腊的古典文化以及罗马文化，开始形成以基督教为主的文化格局。相对于先秦与希腊、两汉与罗马，此时的东西文明历经了自轴心时代^①以来的最大变局，即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以及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东部崛起。从整个文明史的宏观背景来考察，如果说中国从先秦到两汉以及西方从古希腊到罗马，仿佛是文明从幼年成长到少年阶段，整体呈现上升势头的话，那么进入2世纪，汉与罗马两大帝国都遇到了重大危机：政治社会动荡、经济破败、内乱外战频繁、思想文化呈现多元态势。经过几百年的动荡整合，中西文明才逐步稳定下来形成新的形态，但其历史走势却就此分道扬镳：中国闯过乱世进入盛唐，仿佛历经青春期的巨变而成熟稳定起来，步入文明的黄金时代；西方则遭遇严重挫折，陷入漫长的中世纪。在这四五百年的转折期中，思想文化的转型具有突出的地位。不同思想经过接触交流、冲突对立和相互借鉴吸收，最终整合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形成新的思想文化格局，同时也对之后的文明和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具体而言，公元初时，中国的思想生态是表面上以儒家为主，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但各家仍在官方的舞台底下生存发展与竞争，比如黄老道家^②学说就长期潜伏发展，而此时的佛教之于中国还仅仅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在同一时段的西方，罗马帝国统治着地中海文化圈，它在文化上既深受希腊影响，又独具特色，而希伯来教对帝国而言还只是边疆的一个小教宗。可以说，彼时的中西思想文化体系尚维持着生态平衡。

但到了汉末与罗马晚期，两大帝国都陷入社会经济危机频发、文化衰落的境地。儒家遭遇名教危机，人心思变，玄学乘机兴起，在儒道结合中脱颖而出，一度独领风骚。佛教于此时开始发力，以玄佛杂合的格义法来暗度陈仓、移花接木，不断扩大影响，最终逐步金蝉脱壳，在中国站稳脚

① 德国历史学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 1883—1969）提出的著名概念。所谓“轴心时代”（Axial Age），指公元前8—公元2世纪，在中国、古希腊和古印度等地出现了人类文明的飞跃，并喷出一大批思想家和思想原典，塑造了中西印文明的基本格局，对之后的历史发展具有极其巨大的影响。

② 本书基本不涉及道教，仅在必要时一笔带过。一则道教典籍并未如佛经那样发生翻译活动；二则出于与西方对比的研究需要，无法纳入道家；三则篇幅有限。

跟。而道教同样借机兴起，在儒释两家影响下建构起中国本土的宗教形态，使中华思想文化格局开始形成儒释道共存的形态，并一直延续到近代。因此，魏晋南北朝可谓中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发育和转型期之一，也是一个文化大会通的时代，同期的罗马亦然。基督教从东部开始不断扩散，最终竟成为罗马的国教，并在西罗马帝国亡于蛮族之后，成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实际掌控者。不过基督教并非完全摒弃其他文化，作为一个文化底蕴还不够深厚的文化体系，它通过吸收整合希伯来、希腊和罗马文化，形成以宗教为主的综合文化模式，并逐步承担起罗马帝国的思想文化职能，从罗马帝国时期的一个子文化发展成为中世纪的主流文化。总体而言，中国是儒释道三合一，西方是基督教的一含三，两种思想文化形态大致都是在魏晋六朝到唐初以及罗马晚期到中世纪初期开始出现并初具规模的。魏晋六朝与晚期罗马时期作为中西文明史上的文化大会通时代，在时段与作用上遥相呼应，从比较粗疏的意义上来说，呈现出一个整体对应和对称的形态。

在这场文化巨变的浪潮中，汉与罗马两大文明的自身机制与状况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内在矛盾，这种不平衡历经数百年的文化接触、文化交流、文化冲突、文化融合以及文化整合，又达成新的平衡状态。而在文化的激荡中，佛教与基督教作为催化剂，无疑是最大的变数。因为它们属于相对的“异”文化，是它们带来新要素、激化新发展。作为外来者或是后者，两者加速打破曾长期维持着的思想文化的生态平衡，其自身则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在两者的密切参与下，原有的不平衡逐步复归新的平衡。因此，对这段时期的佛教与基督教的发展进行比较与对比就构成一个非常具有价值的研究命题。

对佛教与基督教在新环境的生存和发展而言，翻译是最关键的因素之一，甚至在某些方面具有决定性作用。就佛教而言，要从印度文化圈传入中国，就需要将巴利文、梵文以及西域诸语言书写的佛经译为汉语。一个成熟的宗教不能只依靠口耳相传，而更需要定型的经文，才能使思想与教义越来越精确、凝练、系统和深刻，才更有利于传播、教习和研究，对思想内涵及其表述方式进行调整和更新。因此，当佛教和基督教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经文已是一切宗教活动的中心。因而作为经文的生产源头，语言文本的翻译对整个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具有十分深刻的影响。佛教与佛经如

此，基督教与圣经^①同样如此。尽管基督教的发源地是在罗马帝国内，但就当时整个主流文化格局而言仍属边缘的支流。基督教要想传至帝国的更广大地区，就必须把希伯来文或亚兰文（Aramaic）的《旧约》以及希腊文的《新约》译成拉丁文，其中涉及的语言和文化问题，与佛经汉译一样纷繁复杂。

鉴于翻译在宗教语言活动以及历史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我们的研究就有了翻译和文化的双重意义。本书将从思想文化视角出发进行翻译史的研究，对佛教与基督教在其跨文化传播早期所进行的一系列与翻译密切相关的文化性语言活动进行比较研究，以期深化我们对翻译和翻译史的认识，同时也从新的角度探索思想文化发展的规律和特征。

一 跨文化发展

翻译活动自有其特殊规律，而宗教翻译又同时受宗教发展和历史规律的影响，因此，我们所研究的这段翻译史应先着眼于更广阔的思想文化视野，然后再结合适当的译学理论开展研究。根据研究对象的历史文化特征，我们将魏晋六朝的佛教以及晚期罗马的基督教所进行的翻译传播活动视为一种“跨文化发展”。

所谓“跨文化发展”，是指佛教与基督教的跨文化传播并不仅仅是宗教在新文化环境下的延伸发展，而是把整个宗教的发展重心放到新的环境中，把发展的精力放在新的文化体系中。这种发展与其说是传播，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种移植，是整体性地迁移到新的文化环境中，重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先以佛教为例。汉地佛教不是印度佛教在中国的简单复制，因为中国佛教并没有一举一动都受印度佛教的直接影响。这一方面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即最初的佛经是一本本传过来的，翻译什么经、怎么翻译都有很大的个体性，两国的佛教发展就因为地域隔离而产生时差，比如印度2—3世纪新发展的中观论要到4世纪时才传入中国。而汉人对佛教的理解也受制于这种传播方式，发生各种偏移。僧侣对经文

^① 在我们的研究中，“佛经”与“圣经”都指宗教类典籍，不特指某一部书，同时为强调文本的历史发展过程而非作为结果的定本，一般情况下不加书名号。

和教义的理解往往会因为得到更新的译本而发生改变。另一方面,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体系与传统,因而有意或无意地曲解佛教思想。佛法之种固然是印度的,但开花结果都受汉地土壤的影响。这其中存在多种文化与意识形态间的交流、竞争、互补互释。后来当佛教在印度本土衰落后,倒是其在东亚与东南亚的分支获得进一步的发扬光大,体现出之前的“移植”成果。

基督教同样如此。最初的希伯来教囿于中东弹丸之地而很难获得空间,其教义专注于信仰与戒律,强调自己是犹太人的民族宗教。而使徒圣保罗(Paul the Apostle 5—67)的传教则使狭隘的希伯来教变为适合于各地民众信仰的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人们逐步发现了它的各种弱点以及教义中的种种粗糙与纰漏。当希伯来的种子播撒到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土壤中以后,通过吸收新的养分对整个教义进行精深化与体系化,最终让基督教长成覆盖地中海的参天大树。此时的希伯来教与犹太人反倒成为弱势的边缘文化,要遭到歧视乃至敌视和仇恨。

借用生物体为隐喻来看,佛教与基督教的跨文化发展就仿佛两大文化体系向新的文化生态环境的移植,其中充满了各种适应、选择、保留、淘汰等现象^①。作为一种移植,不仅要把种子完好地保存下来,也要或更需要考虑如何本土化的问题。思想文化必须通过语言来思考、表达与交际,跨文化发展的一个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如何跨语言,因而语言和翻译自然就成为关键。从文化角度来看,两大宗教需要实现跨文化传播与发展,而从语言角度来看,就是两种文化需要作出跨语际移植,最终使目的文化和目的语言接受自身。也就是说,思想上,汉文化要接纳佛教,形成儒释道共存的格局;语言上,要使汉语兼容佛教,在汉语中同样形成儒释道共存的格局。这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要让佛教学会说汉语。同样,拉丁文化要形成基督两希罗马共存的格局,拉丁语也必须形成基督两希罗马共存的格局,其关键是让基督教学会说拉丁语。总之,佛教融入汉语汉文化以及基督教融入拉丁语罗马文化,需要语言的定型以巩固跨文化的发展成果。

^① 胡庚申:《翻译适应选择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